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對國際政治的現實和趨勢之觀測

doi:10.30390/ISC.198304_22(7).0006

問題與研究, 22(7), 1983

Wenti Yu Yanjiu, 22(7), 1983

作者/Author：張文蔚

頁數/Page：68-7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3/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4_22\(7\).0006](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4_22(7).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對國際政治的現實和趨勢之觀測

張文蔚

張文蔚博士現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分校國際政治學教授，本文係其為慶祝國立政治大學朱教授建民七五華誕而作。特為刊出，以饗本刊讀者——編者。

一、緒言

東方的日本帝國也經不起西方的挑戰而昏了頭，

一般說來，中國人對國際政治有兩種基本看法。其一為中國傳統的看法，因為我們數千年雄據東亞大陸，只有兩度亡朝而未亡國（元、清兩朝）；雖有北方外族南侵（五胡亂華及南北朝的分裂），但中國人的文化和民族精神及立國之制度法典則從未受到外來的亡國滅種的威脅；並且在中國歷代強盛時期，則以睦鄰敦邦的政策治理邊疆，此即所謂朝貢制度（Tribute System），更由於地勢山脈及海洋形勢，西、南、東三方之外族亦未舉兵侵華，反而我國的傳統文明及國威遠揚異域，以文化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國。故中國人民歷代都有高度的安全感、自信心，重文化、輕武力。自秦漢以降，雖有改朝換帝，卻少有舉國陷入大內戰兵患之中。因此中國人從未注意民族主義（Nationalism），亦欠缺向外開發及向外學習的精神，閉關自守數千年如一日，養成自大自尊的安逸習慣及愛好和平的傳統。這種自給自足的富強大國風範和民族睦鄰政策也就是中國文化及民族今後衡量世界政治發展的基本態度，或好或壞，此傳統立場尚須研究及修正，以迎合潮流，而負起大國的責任，致力造成一個和平世界，創造人類幸福。

其二是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後，失去民族自衛力量。西方列強侵犯我們的鄰邦，用堅船利砲破壞我國的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我們傳統的消極抵禦政策無濟於事，故喪權辱國。因為西方工業國家的世界觀和重商政策及國際鬭爭的策略遠非中國的知識份子所能洞察，所以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對西方帝國主義恨之入骨，咒罵他們弱肉強食的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待日本西化、工業化之後，同樣的對中國施展併吞侵略和亡國滅種政策，從侵略滿蒙到「七七」事變，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日本

的東亞共榮圈 (East Asia Co-prosperity) 將更會變本加厲地爲害中國，可見近代中國的外患遭遇爲數千年歷代所未有，是一種史無前例的教訓。孫中山先生起而革命，提倡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以自救，推翻專制以求民主革新 (Democracy) 兼倡民生主義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and Limited Control of Capital) 以迎合不可避免的工業經濟結構和人民的經濟保障。但孫中山先生同樣的咒罵西方的弱肉強食和帝國主義等的戰爭侵略。他按中國傳統的經驗想促進「天下爲公」及「世界大同」的遠景。不論他是在幻想或有此把握，首先他要求中國革新而進入現代化的工商業先進程度，以首先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想所有中國人都讚揚孫中山先生的政治外交主張，以促進各國的國際平等及領土主權之完整獨立，並反對沙文主義及各種帝國主義。

細察之，自辛亥革命成功以來，中國已大部份恢復了主權和失地，也已享受到國際上的平等地位。但中國的內部建設、民族統一、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等尚未達到目的。民主、自由、選舉、政黨制度等尚未臻絕對完善。對外則我們的國力尚未強大，不能有效地影響未來國際政治的發展，我們被夾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在今後若干年中，將採取妥協政策，從國際上矛盾競爭中獲得有利條件和爭取舉足輕重的外交地位，因爲除非整個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成功，人民的知識技能和科學創造有大幅度增加，則我國的地大物博和人口眾多並非實際力量，只是未來潛在力量而已。那末今後國際的現實發展和趨勢將如何？筆者願拋磚引玉以就教於朱教授及國內諸學長。站在中國知識份子立場上，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及數千年東亞的國際關係發展史上看來，我覺得有許多極重要的關鍵問題要提出來討論。

首先我們要同意國際政治是某些國家或文化的伸張延續，國際政治的發展目標、研究方法、理論基礎、防止戰爭的策略、創建和平互信的步驟和理論結構、國際公法的發展及制訂等等，都處處代表某些歷史及文化背景。例如中國人若能按其歷史經驗制訂一個創建國際和平及防戰的藍圖 (A Blueprint for World Peace Among Nations Based on Chines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s Proposed By Chinese Scholar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牠一定和國聯 (League of Nations) 及聯合國 (The United Nations) 的憲章不一樣，也一定會仿效歷代「朝貢制度」的經驗以敦睦近鄰，或表達張騫、班超的古訓以解除武力侵略的窮兵戰患。中國文化講求以「王道」制人，西方近代帝國專賴「霸道」征服。傳統中國的世界觀只限於亞洲局部，而今天的世界觀在政治和戰爭意義上必須包括全宇宙 (The Universe)。除非中國能立即講求科學技術，開發人力物力資源，增進和平與戰爭兩面的潛在實力，除非中國領土主權能統一完整，民主法治能切實而具體的實現，中國的人民和政府是無法領導世界諸國和人民的。相對地，除非今天的美俄超級大國自行破裂崩潰，除非西歐和日本的科技及經濟厚力退化消失，中國將繼續落後而趕不上國際科學及物質文明水準。因此在今後的數十年中，中國人靠自己的人口和地大而想領導世界和平發展乃是自欺欺人而已。進言之，也許再過半個世紀或百年之後，等中國以科技經濟爲基礎的「霸道」實力能趕上或超越其他強國，則中國人的

歷史傳統「王道」文化才能大展鴻圖，而左右鄰邦，也就是說，如要中國人的歷史精神及愛好和平的文化宏揚於世界，這要首靠「霸道」潛力的掌握。亦即是說要有推行「王道」的決心，更要保持「霸道」的潛力而不用。近代人類的禍患多來自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用手「霸道」而口唱「和平」。東方的日本帝國也經不起西方的挑戰而昏了頭，竟用武力對付中國，以致造成自己在第二次大戰中的無條件投降。綜結言之，假設中國人想致力人類和平和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世界大同」，而專唱歷史傳統的成功和平高調是無濟於事的；如果未來的強大中國踏上西方諸國和日本的近代侵略主義之途，則中國人亦不會得到世界其他各國的崇敬，而中國的和平文化就會被淹沒，而中國人就會失去影響世界的良好機會。

那末，今天國際政治的現勢究竟如何？怎樣分析？未來的戰爭何去何從？已有千萬專家學人從事研究戰爭的防止，及和平的維持及擴大。然而見仁見智，各說不一，或裁軍備或防核彈，或增進聯合國和平制度，或致力美蘇之冷戰解凍，但所有這樣的努力，都未能有效解除對世界和平的威脅，也未能制止小國之間的連綿戰禍。筆者願就個人所見，略作簡釋。首先我有以下前提和認識：

1. 自近數百年來，國際政治的體制結構純以西歐發展出來的民族國家為構成分子 (Nation State System)，造成民族主義外侵 (Aggressive Nationalism)。

2. 整個國家公法體系造成國家獨立及主權至上 (State independence & Sovereignty of state)。

3. 戰爭與外交合法的並用 (War as a legitimate instrument of Sovereign choice until after world war II)。

以西方的國際法 (International Law or Law of Nations) 及外交制度來維持國際和平，是有其難於容忍的邏輯矛盾 (Contradiction in Logic itself)。因為基本上這個制度是當年西歐於公元一六四八年以後諸大國為了自保而接受國家平等和主權獨立的結果。事實上他們對外用侵略及戰爭手段征服全世界，把此法制強迫加諸別國。因為西歐諸強國武力侵略，所向無敵，故在世界上厲行殖民主義。唯獨日本、中國未被征服佔領。但中國仍是受辱喪權、割地賠款。就連西歐諸國之間也未能互訂條約或經由外交而免於互相戰爭。綜合觀之，今天的國際法治是西方文化觀念價值的推廣延續。此國際秩序是否合理而能為全世界所接受？尚難預料。因為回教文化、印度文化及中國文化都不能和西方的法治觀念、文化價值互相吻合。例如中國人對不平等條約的法定意義和英美即有不同之解釋，英國政府堅持香港、九龍、新界等三條約之合法有效，中國人則認為此三條約皆係兵臨城下的強迫條約，名曰「不平等條約」或侵略條約。

自第二次大戰以後，亞非諸新興國家經由聯合國組織對國際公法頗有創新的新作風和立場。例如對海底資源的主權及開發問題 (The Law of the Seas on the ownership right and development Control)，都和英美及工業商業先進國家的立場不同。又如回教文化國家把宗教和內政外交放在一起而對人權問題及外交官和使館的治外特權等即不按現有國際公法處理。三年

前伊朗監禁美國外交官及侵入並佔領美大使館又是一例。再者，最難解決的阿拉伯和以色列的衝突問題，按國際公法及現有外交慣例，則阿拉伯各國應於一九四八年隨着聯合國的決議承認以色列的合法存在（Sovereign existence and diplomatic recognition of Israel），但因英美等西方國家於一九四八年經由在他們控制下的聯合國強迫分割英屬巴勒斯坦爲以色列及約旦兩國，故當時所有的阿拉伯會員國全體反對成立以色列國家，結果立國方始，阿猶戰爭即起，迄今已三十餘年，生命、財產、領土等損失無計，這個慘痛的經驗也進一步說明近代的原始歐化國際公法是否能原封不動適用於全世界各新興國家已大成問題，也即是其充足性及合理性對非西方國家的適用都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大成問題（Crisis of the adequacy, legitimac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European Oriented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同時也表現了國際政治變化的趨向，即西方歐美強盛世紀的法律政治價值觀念不能毫無修改的適用於亞非新興國家的未來新世紀。試看我們中國，人口佔全人類四分之一，雄據世界已數千年之久，其文化藝術及人倫制度已早爲全世界知識份子所崇敬，如果能於今後的三、五十年內實現合理的統一，使人民生活合理制度之中，並積極在全民參與的基礎上，推展全面現代化，尤其政治與科技現代化，並建立強大的國防自衛力量，到那時則中國政府和人民即有難能預測的對外影響和領導力量。

二、國際現勢略釋

今天國際政治的發展和戰爭武器的進化、亞非各國的分歧和超級大國的操縱、國家民族主義的膨脹及小國之間的戰禍不絕、聯合國的無力控制等在在都說明了國際政治的實質，也更證明未來發展方向的難測。概略言之，如從政治意識形態的類別來分析，則可有以下的數種衝突與互相調合的更化類型：

A、蘇聯集團的馬列意識形態觀：無論從經濟發展理論，國家淵源學說，或是從國際化的階級鬭爭立場上觀察，共產主義的國際政治及外交發展戰略觀都和一九一九年的國聯盟約（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及一九四五年的聯合國憲章（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有不能調解的理論衝突。這兩個文件都是以維持國際間的集體安全爲最終目的（the achiev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security for all states），而且僅用集體性的和平方法以達成此一目的（by Collective and Peaceful measures of the United Nations），如此才能有效的廢除國際間的戰爭及其合法性（Abolition and illegality of war as a national instrument in its external relations）。如果以蘇聯集團的莫斯科立場來看，則知其絕對不放棄階級鬭爭，不承認民族國家的合法存在，並認爲最終還是不能免除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的一戰，除非在和平共存中共產主義國家能順利消滅資本主義國家，正如赫魯雪夫曾說社會主義終於能埋葬西方國家（We shall bury you）^①。列寧的理論是資本主義終將引發外侵的帝國主義戰爭。雖然今天莫斯科對落後亞非國家採取笑面攻勢和

經濟科技援助的外交政策，但其目的在於分化並孤立美國，打擊中共，抵制西歐和日本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影響力。蘇聯的外交除了自衛安全顧慮外，則以擊毀美國而取得對世界的領導權為主要目標。

B、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政治鬭爭意識形態：自由、人權、民主、法制、以戰自衛，以聯盟及軍備和援外保護自由世界，此種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忽強忽軟，其意志時堅時弱，但此只屬高潮低潮而已，並非放棄目的，甘願屈服。這種領導反共自衛正代表一切基督教文化的存在現實和宗教精神。以美國為首的反共民主陣容正和聯合國憲章及以國際公法為體系的世界政治結構完全吻合。因為今天所有非共產主義國家在尊重自由平等、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外交自主、集體合作和維持現階段的國際組織目標上，是一致的。蓋第三世界國家無能力亦無自衛經驗去抵抗以蘇帝為首的共產集團，當年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就是最好的例證。但美國的民族年輕，內部過度民主，沒有堅強的中央政黨領導，是其在外交上事倍功半、進退無定的主要原因。三權分立的政體限制和公共輿論的冷熱無定，更使美國常常顯出愚笨糊塗和自暴自棄的弱點。從短期計，似乎美國微弱失敗，從長期計，這種全民外交和集體外交或「兩黨外交」(Bi-Partisanship in Foreign Policy)正是美國處理外交的堅強實力。總之美蘇衝突是在意識形態上無法避免的，除非蘇聯改制或放棄馬列主義的長期衝突(Protracted Conflict)外交^②。

C、其他西方國家和美國盟友對目前國際政治的意識形態觀：第三種國際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和美國在基本目標上無嚴重區別，但在對付蘇聯及東歐等共產集團國家的外交、國防及商業政策和美國的立場卻有很大的距離和不同看法。因為他們大多有雄厚的經濟力量，先進科技及防蘇的戰略價值，故其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反共實力消長有極密切關係。這些國家包括日本、加拿大及法國、西德、英國、紐、澳、希、土等盟邦。日本是一新近具有工商業和科學技術的實力國家，也是一個沒有國防建設的依美盟友^③。日本和中共已簽有和平友好條約，其中含有反霸權的反蘇意味。北平政權絕對不贊成日本武裝建軍。數年來日本在美國壓

註① 一九五八年蘇聯赫魯曉夫在被美總統艾森豪邀請來美訪問中，曾不客氣的暗示其堅定的信念：“We shall bury you”這是他自己的話，當時蘇會的外交和平攻勢是「和平競爭」(Peaceful Competition)及「和平共存」(Peaceful Co-existence)。該時毛澤東和赫魯曉夫正在明爭暗鬥，他公開的說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War is not inevitable)，而毛則指美國為紙老虎，認為「東風壓倒西方」等謬論。

註② 蘇聯的馬列外交意識形態反映其政權存在的意識形態(Ideological commitment)，美國有幾位教授對此有一冊精彩的合著，William Kender and Stefan Possony, *Protract Conflict*，此書對蘇聯外交的戰略、戰術等都有明確的分析。

註③ 日本一九四七年憲法第九條禁止日本保持國防自衛武力，日本對外關係靠外交和平方式而無武力後援，常言「弱國無外交」，今天的日本却是「富國無武力自衛」，對東亞的韓國、中國及東南亞諸國來說這正是一有利安全局面，但對自由世界的反共集團說來，日本沒有盡到保護世界和平的責任，這也證明對日佔領政策的舉止無定，今天美國要日本分擔遠東的安全防務軍事貢獻，日本則不願為之，且日本內部反備戰反國防的民主和平運動(Anti-defense and Peace movements)的力量已很大。有許多書籍談到此日本國防問題，最早的民意測驗有Douglas Mendel: *Japanese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

力下仍感到東山再起擴張軍備或核子國防是自趨毀滅的下策。

鄰邦加拿大雖和美國有極密切的經濟關係，但並不支持美國的許多國防外交政策。法國爲了爭取外交獨立而早已脫離北大西洋聯盟，西歐共同市場各國更在對蘇聯及東歐的商業及外交上和美國常相抵觸，對西歐的軍事防務也意見相左。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在西歐用和平選舉的方式或可獲得政權，倘此趨勢演變爲嚴重局面，對美國反蘇外交當有難以預測的影響。簡單言之，非共諸工業科技先進富強盟邦將繼續增加美國對全球戰略的協調煩惱，使其採取妥協態度。

D、中共對國際政治的意識形態觀：自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以來，其外交雖以馬列主義爲理論基礎，但其幻想作風，使其自動願做蘇聯的盟友^④；到一九六〇年與一九七一年採反蘇反美的孤立政策並造成文化大革命，而爲人民帶來浩劫。自一九七一年以來中共與美修好，而造成與美蘇三角神秘國際戰略關係，自「十二大」以來中共又傾向自力更生的協調外交，而以第三世界國家之一自居^⑤。蓋中共的外交意識形態不能不反映近百年帝國主義侵華的民族公憤和缺少國防安全的自衛武力及長遠的國家民族利益，中共的外交在東亞也反映出中華民族的傳統領導慾望，無論美國和蘇聯在亞洲擴張勢力都不爲中共或中國人所樂見，中國所急切需要的是能迅速達成國防安全和工業建設現代化，以改進全體人民的生活和真正的外交自主，並成爲東亞的未來和平建設的柱石，這樣才能符合中國人民的願望。但共產主義能否協調修正以發揮中華民族傳統的「治國平天下」的意識觀念？是難以預料的。

E、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政治意識形態：第三世界的國家是國際政治發展轉變過程中的棘手問題，所有這些國家具有或多或少或參加國際冷戰和聯盟體系，都希冀能同時獲得美、蘇兩大集團的經濟、科技援助而不帶任何政治條件 (Economic/Technical Assistance without Political strings attached)。都屬貧窮而內政缺少安定並時有內戰的威脅。都有或多或少的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挑戰，並都能在聯合國內採取協調合作的立場，使美、蘇集團無法利用此國際集體外交機構作其宣傳和操縱的對象。這些國家的貧窮問題、自然資源外銷問題、人口膨脹問題等都是美蘇兩集團競爭的絆腳石，這些國家都要建立自由獨立的民族國家 (Nation-States)，故他們既反美更反蘇，故其中一部分國家對當年毛澤東的革命模式曾抱有高度的幻想。簡言之，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政治觀是個嚴重的反抗革命建設觀，不但反美反蘇而且無力自救、缺乏國際政治外交經驗，抱有複雜的幻想觀念。此種意識形態無形中加深了國際間混亂和分歧不安。

從以上五種國際政治現勢的意識形態觀察，蘇聯共產集團觀、美國民主超級觀、日本西歐國家的重商解凍 (Détente) 意識觀、中共的意識形態觀、第三世界國家的意識形態觀，彼此互相有或多或少或多的衝突。此種現實將繼續延長下去，但當務之急是核

註④ 參閱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夏季發表的「外交「面倒」文章，及「中蘇同盟條約」(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簽字)。

註⑤ 見鄧小平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開幕之講話及胡耀邦的「十一大」報告長文。

子裁軍和防止核子戰爭的問題。今後國際政治發展將會有怎樣趨勢，那是值得探討的。我們必須了解：意識形態雖是外交施政的長期指導原則，但並不是國家行動和外交戰略的唯一政策標準，所有國家都在應變過程中往往放棄意識形態的需要而以國家民族的具體利益為準則。

三、國際政治的趨勢

任何人作此項趨勢的探討，都是一種冒險的嘗試，往往因為某一超級國家更換領袖而直接影響其外交政策和戰略，此難預測之一也。有時盟國因內部政治輿論、經濟等之轉變，而調整其外交政策並影響盟國集體行動，此難預測之二也。而且近三十年來，核子武器科學技術及太空科技之突飛猛進，直接影響到美蘇超強之軍備國防競賽及人民之不同反映；軍備競爭更無限制地涉及經濟結構的變質和人物質生活的緊縮，故而造成裁軍防戰的和談等。由於科技及軍事科學發展競賽的成敗進退無法預測，故其對國際政治趨勢的影響，就更難想像了。

雖然對國際政治發展在短程上難於預測，但在長程上是可以列舉項目以為例證的。如：

1. 兩個超級國家將繼續進行武器科學研究和軍備競賽，其目的不在熱戰，而是要阻止對方發動偷襲，故必須不斷加強被襲擊之後的剩餘還擊力量 (This is termed as "second strike capability" after having been attacked and still remain able to destroy the enemy totally)。目前及今後美蘇兩國都將遭受國內反對軍備競賽的強大壓力 (domestic antiarms race movement)，但競賽的目的卻是想在軍事科技及武器轉變中，維持難能維持的恐怖均衡 (Balance of terror)，競賽的速度可能因裁軍談判而降低，但不會因裁軍條約而停止競賽。雙方都無意發動戰爭，但因防止不測而引起戰爭。軍備競爭將會因經濟力量之崩潰而自動降低。今後競賽的重要目的將是為增進外交談判力量、國際間的影響力、友邦的信心及信賴 (Credibility in the eyes of allies) 等。故無論有效與否，裁軍談判將不會停止。

2. 西歐民主國家將繼續邁向獨立自主的商業及外交，將發展和蘇聯及第三世界諸國之間的友好關係，使美國在北大西洋公約聯盟下不易團結盟友，而使蘇俄趁火打劫以增進東西歐間之解凍 (Local Détente in Europe only) 和工商業的交往。

3. 日本在今後的十年內將以小心而謹慎的態度增強國防軍備，其目的是適應自己的需要及增進與美國之合作，但又不驚動北平及莫斯科為重要原則，因為日本以保持與中共在政治外交上的修好為首要目標，並想利用擴軍以爭取蘇聯的畏懼及讓步，期能收回北方四個小島，並進而形成日本在亞洲國際上舉足輕重的份量。如此則日本可和中共同時被視作亞歐的政治強國。

4. 以阿戰爭與美蘇在中東的競爭：美國三十年來為了對抗共產集團的冷戰，兼受國內猶太人的壓力，盲目地支持以色列在中

東再三用武力侵略阿拉伯諸鄰邦。以色列先後在一九四八、一九五六、一九六七、一九七三年等以阿戰爭中獲得勝利，驅逐許多巴勒斯坦人離境，使以國領土比過去增加了許多。以色列從事戰爭的武器及軍經援助都來自美國政府及民間，但以色列已在聯合國為大多數會員國所不齒，幾乎於一九八二年十月被驅逐出聯合國，幸賴美國出面支持，始得保住會籍。今後十年中美國可能因偏向以國而內外受到輿論壓力和外交孤立。我想美國可能放棄以國或強迫以國改變侵略政策。在越南戰爭上美國曾有過折兵辱國的失敗經驗，在以色列問題上美國既不約束以國的侵略、霸佔及違反人權行動，又不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而與其談判，是美國自趨孤立的反常行爲。美國如不猛醒，將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5. 蘇聯在過去十幾年中已變成名副其實的超級國家，可以在核子武器的競賽上和美國不相上下。但在今後的十年、廿年中，蘇聯將遇到許多可以預測的困擾和難關。能否繼續順利控制東歐諸國而免於類似目前波蘭的內亂破產，是一嚴重顧慮；是否有永久的軍事佔領和消耗負擔能力而盤踞在阿富汗，又是一個嚴重考驗，爲了佔據阿富汗，莫斯科要付出下列可能代價：增加與回教及中東各國的仇恨，阻礙和中共修好，在聯合國中受西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反對，對蘇俄自己的公民無法解釋，造成俄共統治階層中的內鬨，並可能遭遇到回教國家的共同抵制。這樣的代價實在太高，但蘇俄不像美國這樣的民主輿論國家，在政策上可進、可退，料必採取下列處理途徑：繼續堅持赤化俄化阿富汗並佔領和清剿阿富汗游擊隊，但如果代價太高，莫斯科可能於五、六年後自阿富汗以盟友條約方式撤兵，讓阿富汗恢復以前的中立外交路線。

6. 聯合國組織會將在一九八〇及一九九〇年代增進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這個定論是根據下列的可能情況而提出：a. 第三世界國家將陸續更形團結，b. 中共將努力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立場，c. 中共依賴美國以抵抗蘇帝霸權主義的成份將陸續於十年之後降低，d. 美蘇兩個超強國家的外交及冷戰，將可能從降低軍備而回到聯合國內，以爭取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e. 美蘇之間的解凍或局部修好將造成雙方合作機會，此種協調可增進聯合國安理事會的政治外交能力及其他機構的經濟和技術援助能力，此將有助於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戰爭衝突之減少。

7. 美蘇兩大超強之間終將因核子武器競賽，而造成國內經濟制度及生產結構上的破產，這是最具體的壓力。其次還有公共輿論反對核子戰爭的和平運動壓力 (Anti-war demonstrations, anti-nuclear weapons demonstration, etc.)，更有知識份子的壓力，環境保護衛生反戰運動的壓力等 (Anti-nuclear war movements & strikes b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ists)。並且美蘇兩超強國將被迫失去對盟邦在外交、軍事同盟和戰略上的絕對控制力。凡此種種壓力，終將造成美蘇之間的覺悟而走上協調解凍。以保持兩國在國際上的獨立控制力，爲了本身長期利益及在國際間的影響力量，美蘇間相互協調和彼此容忍，是不難理解的。這種新的局面遠勝過今天的無限制的核武器軍備競賽。這就等於美蘇兩國將默許和接受「和平競爭」的方式 (Peaceful Competition) 及「和平共存」的非戰原則。如能有此局面，那將是國際政治上的一大進步，將更接近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傳統

文化，則國際間的政治外交可指向非權力政治 (Orientation toward non-power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能如此，則弱小國家對國際政治的實質參與將無形中提高了。我這種想法可能難於實現，不切實際，但總不失為一種國際政治的理想更化過程。

8. 中華民族在今後的廿年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無論是中國於本世紀走向統一，或是在民主、法制下提高人民的物質及文化生活，享受自由，中國還是會特立獨行的影響美蘇之間的關係。中國大陸內部政體的穩固、政權的安定、政治意識形態的轉變、經濟制度的革新創舉，雖都是未知數，但某種程度的變化的發生，是絕對不可避免的。而這種變化絕對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美、蘇及亞洲區域的外交策略，也一定會導致美、蘇及亞洲地區各國（如印度、印尼、日本等大國）的強烈反應。那時也就是美、蘇兩國要見風使舵，調整其對華政策的時候了。其運用之妙，當仍為三角外交關係的神秘延伸。

總而言之，中國人是極聰明的，也是會運用「以夷制夷」和「愛好和平」的傳統經驗的，無論未來的轉變如何，中國的地位和角色在亞洲及整個國際外交上都將會節節上升，這將是中國人應享的尊榮。但如果今後十年或廿年後，中國不為亞洲鄰邦所尊敬，則日本、印度、印尼等國將趁機而起，而導致對中華民族利益之損害。

四、結語

以上幾種對今後廿年間國際政治趨勢之揣測，個人並未經過深思熟慮，亦未花引證研究工夫，只是就個人數十年教授國際政治的經驗作些個人主見偏識的預測，這些預測既無理論基礎解釋，亦無外交文件的引證，但卻是一種深察直覺的忠實推敲，更是对各國近百年來外交行為之評述。以上幾種例證的趨勢預測，是從假設情況或條件下而作出的因果關係推論。如果國際政治學者願多從大膽的假設中去小心的求證，則近百年來外交史集和國際政治與戰爭的經驗資料皆可用假設求證的方法，作出有系統的科學研究結論，以嘉惠從政與學者研究的便利。

中國人近百年來備受列強帝國的欺侮侵略，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對國際間的因素分析不夠，對戰爭與和平的具體因果也未作精密的假設求證研究。中國滿清官吏及民間反應，由仇外、懼外而媚外。直到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許多政治外交負責人還是對國際政治一知半解，往往以中國文化、做人的道德觀念，對外來的因素及壓力作些幻想式的結論。例如：列寧、史達林想把中國的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當初並不為中國領導階層所洞察，史達林想把中國變成蘇帝的附庸國，而毛澤東當初亦未能料及，直到赫魯曉夫時代才告決裂。今後，我們必須加強對國際政治外交的了解，俾能預籌對策，以確保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